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出版）

本期目录

【不堪回首】	母亲长达三十年的交代史	顾 土
【国际风云】	一位美籍华人学者眼中1970年代的文革中国映像	萧 象
【往事非烟】	陈毅批判会纪实	王宗禹
【亲历者言】	武汉地区文革初期的“五十天”（下）	杨道远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不堪回首】

母亲长达三十年的交代史

· 顾 土 ·

（作者简介：顾土，原名陈原。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出版社工作，1985年转职报社。专栏作家，文史学者。）

先父陈兆祺是档案学者，将一生都献给了档案教育事业。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我还发现了他生前为先母所建的档案，其中有1952年11月到1954年1月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研究生的毕业证书，有1981年4月16日追悼会的悼词；还有一身极其珍贵的土布军装，母亲曾经穿着这套军装，1949年4月随大军渡江，5月进入上海。

但是，保存最多也最令我震惊的，却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镇压反革命运动到文革期间，先母所写下的一篇篇交代的底稿，以及先父亲笔抄录的1975年12月北京师范大学和1978年12月中国人民大学对先母“历史问题”所作出的审查意见与审查结论。

这令我想起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一件往事。当时全国上下都在清理、销毁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中保留在人事档案里的所谓黑材料，尽管都是整人和被整的记录，显示出每个人身上的各类“污点”，但我父亲却认为这些材料同时也是一段历史时期里形成的真实记录，作为档案本身而言，并非伪造，同样具有历史价值，应该继续留存、妥善保护，让后人永远了解、铭记那个时代。

身为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教师的父亲特意致信人民日报，从档案保存的角度，阐释自己的见解，人民日报将信发表在“内参”上。但我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他将先母交代文字的底稿也保存下来，使我在半个多世纪后得以面对这些凝结大量历史信息的沉重语言，一遍遍阅读熟悉的字迹，再次怀念早逝的母亲。

先母潘嘉，原名徐默文，江苏丹阳人，1927年5月12日出生，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不过20来岁，文革爆发那年，还不到40岁，可写交代却伴随了她的人生。

先母一生究竟写过多少交代，不得而知。但仅翻阅现有的这些交代底稿，就已令我心头格外压抑，因为母亲所交代的竟然都是8岁到21岁之间所发生的事情，而这个年纪，她才是个学生。

从8岁到21岁，母亲的人生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让她后来屡屡交代，难以挣脱，直至被打成“反动党团骨干”“阶级异己分子”“中统特务”“历史反革命”，最后，一项“特嫌”的帽子又整整戴了7年？

◇ 四十五岁半身不遂，五十四岁撒手人寰

1967年12月15日，寒风凛冽，对我来说，这一天刻骨铭心。

晚上，父亲带着我们从外面回到铁一号。铁一号就是北京张自忠路三号，人民大学宿舍，我的家。母亲已经失踪好几天了，问父亲：妈妈呢？他的回答总是：在西郊忙运动！

铁一号大门灯光昏暗，一迈入红漆大门，冷风迎面扑来，眼前的钟楼格外阴沉，没有一个行人。父亲加快了脚步，拽着我们沿着缓坡赶紧往上走。但我忽然发现坡面有一条刚刚刷上的巨幅标语，从钟楼前一直刷到大门口，每个字都有斗大。谁又被打倒了？我十分好奇，挣脱了父亲的手，沿着缓坡看上去：“打倒中统特务、阶级异己分子潘嘉！”字字都让我心悸不已。

父亲一把抓住我的手：别看了，赶紧回家吧！其实，不看我也一样会知道。灰楼、红一楼、红二楼，当我们走过时，铁一号上空正回荡着大喇叭的广播声，一男一女、一人一句，声音清脆高亢：战报！战报！现已查明，我校档案系的潘嘉是隐藏在我们身边的国民党中统特务、三青团骨干、历史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

回到红二楼丙组一号我的家后，父亲马上将我们兄弟三人关进卧室，叮嘱我们：千万不要出来。正在我家帮助照看我们的姨外婆死死把住卧室门，不准我们出去。

此时的窗外，已是汽车逼近声、大呼小叫声不断，声震屋宇的插门声接着响起。我听见父亲开门，然后有人在厉声喝问，家里似乎顿时挤满了男男女女，吵闹不休。有人敲我们的卧室门，姨外婆打开门，几个人进来看了我们一眼，又出去了。姨外婆再次将门顶住。

门外整整喊叫了一夜。次日清晨，我去上学，父亲已经不见了踪影，几个陌生人仍坐在我的家里，有人质问我：你妈妈呢？我回答：不是让你们抓走了吗？

从这一天起，我们就开始在胆战心惊中过日子。父母不见了，家也被抄了，周围是冷漠和歧视的目光，大标语、大字报隔三差五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母亲的名字已经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每天晚上临睡前，我们都用父亲早已准备好的木板将窗户顶上，但还是不断有人在夜间砸门，声称查户口，一些愣头愣脑的人经常进来转一圈，问了几句话又走了。在天津大学教书的三姨和三姨夫听说后，赶紧来到北京，将我们兄弟三人都接到天津。

直到父亲被释放后，我才回到北京。见到父亲时，从他的举止中发现他曾被暴打过。原来殴打他的就是他的学生，打的时候先用麻袋将他罩住，再用麻绳绑住。

给母亲按上各种罪名的最初是人民大学的群众组织“新人大”，但没过多久，与“新人大”对立的另一派“人大三红”也将母亲“揪”了出来，两派都称我的母亲是中统特务、反动党团骨干、阶级异己分子。母亲长时间被拘禁在西郊的人民大学。

当时，我年仅10岁，四周过去非常熟悉的叔叔们忽然间不是冷若冰霜，就是如凶神恶煞一般。有几个专程去南京轮番审问我的外公、外婆和舅舅，有一个将我的三姨从天津骗到西郊人大，拍桌子瞪眼睛地要她揭发我的母亲。一天，有一邻居过来找我，说我母亲被关在西郊，要我带着她所急需的生活用品，赶紧去西郊看她。

我换了几次车终于来到西郊人民大学，这是我头一次走进西郊人大。人民大学正被两派分割，四处都是防御工事，外面见到的人个个头戴头盔，手持长矛和棍棒，高音喇叭在互相攻击。

我打听了半天，才来到一座教学楼的教室里，里面有的面孔并不陌生，一个住在我家楼上，一个就住隔壁。他们看见我，失去了往日的亲切，我也没敢称叔叔，只问他们：我妈妈呢？他们回答，你把东西放下吧。你妈是反革命，不能看！

被关押期间母亲是什么情形，我从来没听她提起过，她去世以后，曾与她关押一处的方志西（人民大学原副校长邹鲁风夫人）回忆：潘嘉同志很坚强、有原则，从不屈服！究竟如何坚强、怎样不屈服，她没细说。

1968年的8月，军宣队、工宣队进驻人民大学，两派武斗停止，我想，这回我总能见到妈妈了，可是却接到母亲的一封来信，说她已经到北京水泥厂参加劳动，周日可以过去看她，还告诉我如何乘车。北京水泥厂在五棵松，那时我觉得五棵松好远，坐了很长时间的公共汽车才找到。少年时就患有严重风湿性心脏病的母亲，时隔8个月，当我见到她时，她走路迟缓，面容惨白。那年她仅41岁。

紧接着，殃及全国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来临，母亲再次被当作重点审查对象，父母都住在西郊人大，不能回家。有一天他们终于回到铁一号的家里，可次日在我家里就召开了一场家庭批判会。来了一个军宣队的军人，还有一个档案系的女学生，高高的个头，披着军大衣，趾高气扬。

军宣队员先来了一段开场白，随后女学生发话，她自称是革命军人出身，直呼我父母的名字，连老师都不叫。她先讲了半天我母亲的历史问题，然后就要我们一起帮助我的母亲认清历史问题，老实交代。我们一声不吭，全家静悄悄的。女学生只得在那里独自述说了一番自己的光荣革命家史，介绍了一通自己是如何学毛著闹革命的，说以后这样的家庭批判会还要经常开，过后就和军宣队员匆匆离去。

家庭批判会尽管没有再开，但父母依然住在西郊人大不能回家。1969年11月，我们全家终于团聚了，地点却是在江西余江县的锦江镇。父亲先赴江西，母亲被允许回家后卖掉了家里的所有家具和书籍，退掉了铁一号的房子，办理了户口迁出手续，然后拉着我们，随着人大的几百号教职工和亲属，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到达鹰潭。

到达鹰潭时夜幕已经降临，下车后我看到母亲坐在行李上，不停地喘息，但她还是强打精神，站立起来，背着行李，要我们手拉手，跟随人群，千万别掉队。她不时将手按在我哥哥的肩头，好像要摔倒的样子。一位过来打招呼的阿姨发现了，告诉我们说你妈妈恐怕撑

不住了。我们赶紧将妈妈肩上的行李都扛在自己身上，那年，哥哥13岁，我12岁，弟弟9岁。

鹰潭街道路灯不亮，数百人在黑暗中前行，从火车站走向码头，活像逃难的队伍。好不容易来到江边，眼前这条江叫信江，我们乘坐机动船前往锦江镇，江风吹来，分外寒冷。机动船行进了很长时间，我不停地发问：怎么还没到啊？母亲说：快了、快了！终于，岸上一片灯火摇曳，那不是电灯，而是盏盏马灯，先到的人们正在岸边提着马灯等候我们。其中就有我的父亲，他高举着马灯，呼唤我们的名字。

我从来没在南方过冬，到了江西才知道，原来在这里过冬比北方还冷。房子的木板墙露出一条条缝隙，雨雪过后，即便白日外面有了阳光，屋内却依旧阴冷潮湿，夜里，被子加棉衣，整个头蒙在里面，还是直打哆嗦。母亲的心脏病加重，就留在锦江镇学习，父亲去了刘家站，那里是人民大学五七干校，距离锦江镇50公里，一个季度才允许回来一次。

母亲学习的地点在五七干校驻锦江镇办事处。外婆客死天津，我拿着加急电报赶去找母亲，她正坐在马扎上学习，当即抱头痛哭，坐在她身旁的人民大学副校长崔耀先和档案系的同事李毅慌忙劝慰她。母亲想请假去天津奔丧，但被拒绝，前一年我的外公去世时，同样也不准母亲回南京。

母亲是孝女，不能见父母最后一面，心灵的伤害更让她病上加病，躺在床上多日不能下地。尽孝不能，养病很快也被终止，一声令下，母亲去了刘家站。在五七干校，夫妻分离，男女分开，父母相隔也很远。

我骑着自行车翻越丘陵、涉水过河，去刘家站看望父母。只见我的母亲正蹲在那里分拣石头，人显得十分虚弱。

锦江镇闹肝炎，许多孩子都患病，父母便叫我带着弟弟从鹰潭坐火车去浙江湖州投奔我的姨外婆。母亲不能送我们，父亲只能送到鹰潭火车站。我探出头去，向父亲招手，看着父亲孤独的身影，想到母亲还在石场分拣石头，赶紧扭过脸去。

住在浙江湖州，我只接到父亲的来信，从没见过母亲的字迹。一年后，当我接到父亲的电报，让我回北京后，我才知悉，母亲在干校曾多次被送往医院抢救，还专程去南昌医病，但病情从未好转，一拖再拖，直至根本不能劳动了，才同意她返回北京治疗。

在铁一号红三楼丙组二号，母亲、哥哥和我住在其中的一间房里，我们每周都陪母亲去阜外医院看病，母亲一举一动看起来好累，弯下腰也会喘息半天，去食堂买饭都吃力得不行。

1972年3月的一天，她忽然倒在地上，送往医院后，虽然救了过来，但从此半身不遂，这一年，她年仅45岁。卧病九年，1981年3月30号，母亲永远离开了人间。去世那年，她只有54岁。

◇ 一顶“特嫌”的帽子，整整戴了七年

回想母亲的一生，卧病九年，也就是半身不遂的九年，大概是她最幸福的九年。

这九年，母亲的思维十分简单，复杂一点的事情，她都是摇摇头；她的记忆单纯，那么多痛苦的往事，似乎已经从她的脑海里彻底抹去；她言语表达浅显，可用的词句不多，无法用丰富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其实她的心情也只剩下一喜一怒而已。

人民大学被撤销后，父母一起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1975年12月，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专门作出《关于潘嘉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次年1月23日，北京师范大学特意来人将意见告知母亲，我清晰地记得，当时她面无表情，好像在努力回忆什么、思索什么，最后在我父亲的帮助下，签上了自己的姓名。1978年12月28日，已经恢复的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对母亲的历史问题再次作出结论，母亲面对结论，只是微微一笑，她究竟还记得些什么，事后我问过她，她只是摇头。

无论北京师范大学还是中国人民大学，对母亲的“意见”和“结论”都称，文化大革命中对她的历史问题进行了审查，最后，“特嫌”问题应予排除，参加三青团问题应予排除。这表明，母亲的两项历史问题整整审查了7年，如果按照人民大学的结论日期，就是审查了整整10年。尽管最终都是“应予排除”，但母亲此时只是一个半身不遂的病人，任何审查和嫌疑，对她都已经无所谓了。

这九年，我们住在铁一号红三楼丁组四号，寒来暑往，父亲精心照顾母亲，母亲什么都不必思考，只有一步一挪，缓慢散步，只有从早到晚斜靠在椅子上，静静休息。她亲眼看见我们兄弟三人相继考上大学，在她的心里，除了我们之外，似乎什么都不重要了。望着母亲对往事的麻木，对政治的冷淡，对社会风向的无动于衷，我怎么也无法与过去的母亲联系起来。

1947年5月，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五二零运动”中，她曾冲在上海暨南大学学生游行的最前列；1948年3月，她以暨南大学女同学会干事的名义公开号召全校同学赴杭州春游，其实是集体致祭1947年10月被害的浙江大学学生于子三；在暨南大学著名的“四八”反迫害行动中，她又成了名人。

1949年4月，她英姿勃发，挺立船头，身为“解放大军”的一员，横渡长江；她曾满怀豪情，身着军装，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上海，在外滩与当年的地下党战友欢声笑语，合影留念。可最后，这一切在她的心目中灰飞烟灭。因为最终所有的历史经历留给她的都是痛苦与折磨，无非就是一次次的交代、交代。

我的母亲曾经非常“革命”，也曾经特别“进步”，而且发自内心。在《人生不是梦——红军女战士程桂芬回忆录》中就提到过我的母亲，说她是进京路上的组长，从北京火车站下车后，她要求大家排起队，整齐划一，走进市里。母亲最喜欢唱的歌，曾经是《唱支山歌给党听》；最爱给我们朗读的小说是《红岩》，总让我们收听的广播是《王若飞在狱中》。但当《红岩》被批判为大毒草、作者罗广斌惨死，早已遇难的王若飞也被定为叛徒时，母亲就沉默了。

文革之初，她曾和同事一起组织了“从头越”战斗队，四处摘抄大字报；1968年1月29日晚上，也就是农历除夕夜，在她写下的交代中，抬头就是“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党”，结尾就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全校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但卧病之后，在她的有限言辞里再也听不到任何政治词汇，革命与她完全绝缘，因为革命的结果，不过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审查。

1973年开始，母亲当年在暨南大学读书时的同学、在上海地下党的战友、在中共中央华东局秘书处工作的同事，纷纷从牢里、从学习班中、从五七干校出来，重新工作。他们常常来看望我的母亲，聚会吃饭，畅谈往事。我不时被父亲派到东四十条路口的江苏餐厅要几个大菜，带回来摆上桌面，然后坐在那里，听他们闲聊。

常来的有费志融，他是母亲在上海地下党的直接联系人，曾任纺织工业部计划司司长、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副总经理；有徐萌山和石敏夫妇，徐萌山是台湾人，常年担任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秘书长，石敏就是我母亲的入党介绍人；有金尧如，他当时是香港文汇报总编辑，每次聊天都是绘声绘色，中外典故脱口而出；还有一位张连，他在文革前曾是中共晋江地委副书记，后又当过福建省委对台办副主任、福建省科委副主任；白明来的次数很多，他也是台湾人，少时曾经练过马术，在上海暨南大学游行时，他奋不顾身，冲向前来弹压的宪兵马队，将头马扭转过来，其事迹传诵一时。

几年前，我在台中市的诚品书店看到一本《一九四六，被遗忘的台籍青年》，里面看到了多位我熟悉的名字，都是母亲的好友，其中就有白明。原来，1946年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为了让台湾学生尽快接受中国的高等教育，专门举办了一场公费生考试，录取92名学生到大陆的大学就读。不想，1949年后，这些公费生的三分之一留在了大陆，与台湾亲人一别就是几十年。

来看望母亲的还有母亲在华东局工作时的两位老上级，一位是上海市档案馆馆长罗文，1927年就加入中共；还有一位是李波人，曾任刘少奇的秘书，在秦城监狱蹲了9年，1975年才见天日。李波人的家就住在魏家胡同，距离铁一号很近，所以常来我家闲坐。

他们在我家里聚会时，母亲都是靠在旁边静听。他们聊的那些往事，母亲是否还有印象，我不知道，但在我的心中却记了下来。知道了他们当年在暨南大学的学生生活，知道了他们是怎样在沈崇事件后策划游行示威的，知道了他们这些地下党员是如何入党、如何联络的。而李波人，原来1935年5月开始，他就在苏州军人监狱坐过两年多的大牢，在他的一生中，有11年是在牢中度过的，既坐过国民党的牢，也坐过共产党的牢。

但我最不解的是，在他们交谈时，只要一说到当年的地下斗争，虽然惊险，尽管有性命之虞，但都津津乐道，神采飞扬，不无自豪，而且事无巨细，记忆犹新，而一进入他们从地下转入地上，还担任了各种职务后，却几乎很少提及，似乎处于失忆状态，也失去了那种意气风发的感觉。或许，他们根本不想记起或言及一些令人不堪回首的往事。

◇ 母亲的交代，说的都是什么

在母亲的一生中，有两次遭遇罪名：一次是1948年，当时的“特别军事法庭”以“共匪间谍”罪，对母亲发出逮捕令，暨南大学开除了她的学籍；一次就是文革，其间最重也是延续时间最长的罪名便是“特嫌”，即特务嫌疑，另一项则是参加三青团的嫌疑。

罪名，在中国的历史上已是无奇不有，因文字而锻炼成狱，史不绝书；株连九族，则是世界之最；而腹诽心谤、莫须有之类，更是天下一绝。但到了历次政治运动，尤其到了文革，所有罪名加起来，可谓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且登峰造极。言论、思想、日记、写作，不但可以获罪，还能处以极刑。

修正主义、经济主义、阶级异己分子、社会关系复杂、里通外国、历史复杂、历史问题、坏分子、特嫌、右派、“恶攻”等等，如今听起来，根本无法想像，怎么也能成为罪

名？然而，这，就是我们经历的一段历史，就是我们曾经度过的岁月。这些莫名其妙的罪名，其特点就是内涵宽泛、无边无沿，可以随便取舍，任意诬陷。只是嫌疑，而且是捕风捉影的嫌疑，就足以将人审查、批斗、关押、审讯、劳改，身陷囹圄，直至处决，还能株连亲人、同学、朋友，影响所有的生活。

从母亲的交代底稿里可以看出：

我的母亲成长在南京，家境贫寒，十个兄弟姊妹里只活下来五个，虽说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长期担任教师，但在那个几番易色的都城生存，也发生过各类“历史问题”。

我的母亲先后在南京临时大学、上海暨南大学读书，前者拥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后者的学生中有很多是华侨或华侨子弟，有的还来自台湾，这让母亲和同学们在新社会不能不被审查，互相作证。

1947年，我的母亲加入中共上海地下党，投身地下学联领导的学生运动，而地下党员，尤其很多城市地下党员后来的遭遇，曲折坎坷，磨难重重，身为其中一员，母亲自然在劫难逃。

1951年11月，正值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母亲写下的交代就是让她证明、说明当年在上海暨南大学与她相识的那些人的情况。从怎么认识他们的、他们当时的政治表现和思想状况，一直到他们何时入党、有无被捕、参与过哪些社会活动、还认识哪些人等等。其中有一位张连，母亲在世时，与我家往来多年，其丰富的革命经历值得一叙。

张连是福建安溪人，至今仍健在，被报刊誉为“百岁革命老人”。他原名林绿竹，1939年加入中共并任安溪龙门支部书记，在暨南大学读书时，担任过地下党支部书记，还任全国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的宣传部长。1946年他带领一批暨南大学、集美学校学生党员到台湾创建闽西南白区中共台北支部，曾四处台湾，以闽西南白区中共巡视员身份在台湾从事地下工作，1948年5月参与组建中共泉厦临时工委并任书记，当过中共安溪中心县委书记、闽粤赣游击纵队八支四团副政委。

1948年初，张连自台湾回来后住在大公报主笔李纯青的家中。李纯青也是安溪人，又多年定居台湾。那时，暨南大学有几位来自闽南和台湾的学生常去李家玩，母亲与这些人是要好的同窗，因而也成了李家的常客。在李纯青家，母亲与张连相识。在母亲的文字中，我看到了据她所知：张连在当时一共发展了几个中共党员、张连的经济来源是什么、在上海和我母亲见过几次、在南京何时何地见面、南京见面的谈话内容、张连爱人的情况等等。

这一时期，母亲所写的交代，显然是因为有人受到审查，所以要求母亲出面作证。

在母亲的交代底稿中，篇幅最长字数最多的两份，一份交给档案系“革命师生”，一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前者是当时揪出她的那两派群众组织，后者就是被派驻人民大学、执掌学校大权的军宣队。这两份文字，母亲交代的历史问题，几乎一致，可谓不厌其详，一丁点事情，都要反复述说。

母亲交代了她的家庭，因为我的外祖父曾被认定有严重的历史问题，1955年“肃反”时，外祖父曾被当时正任教的南京同济高级工业学校开除，但1956年又被恢复教职。母亲没有说的是，这是因为1956年调整了知识分子政策。我的大舅舅在南京加入了三青团，1946年到杭州青年军学习，做过副分队长，在南京金陵大学读书时又参加刚组

建的新中国海军，1956年复员，1958年被划为右派，判处劳动改造。母亲没有说的是，我的这位大舅舅从海军被迫复员的原因就是他曾经参加过三青团，而我直至1981年母亲去世时才第一次见到舅舅。20多年来，他一直在做苦工，与我见面时，已形如骷髅。

母亲八岁时有什么事情需要交代呢？原来那时我的外祖父在小学教书，而潘文华（民国二级陆军上将，28集团军总司令兼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1949年12月易帜，任新中国西南军政委员会常务委员）的弟媳妇在其夫逝世后正带着三个孩子住在南京，孩子们就在我外祖父任教的学校读书，因为学习成绩欠佳，潘的弟媳就邀请我的外祖父常去家里给他们做家教，为了两家更加亲近，她还认我的母亲做了干女儿，我的母亲也因而改名为徐蜀文。这件事，到了文革，便演变为母亲的一大罪状：四川大军阀的干女儿。

1945年初，我的母亲在南京国立师范的文史专科求学。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要求所有日伪统治下的大专学生都集中到南京临时大学补习。临时大学是怎么回事呢？1945年9月下旬，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伪专科以上学校学生、毕业生甄审办法》，规定凡在收复区（即沦陷区）专科以上学校包括已经毕业及尚在校学习之学生，必须通过甄审，始承认其学籍，并在多地设立临时大学补习班，补习后，经过甄别考试，由教育部颁发《审查合格证书》。

这一办法公布后，学生们认为是对沦陷区学生的歧视，不但罢考，还上街游行和请愿，高呼“学校无伪”“学术无伪”“学生无伪”的口号，认为学校不同于政府，不能把沦陷区的学校称作“伪学校”，更不能把学生称作“伪学生”。当局只得取消甄别，改由学生自己按原来年级，选择相应院系到临时大学就读。1946年6月，临时大学撤销，应届毕业生修业期满者，发给毕业证书，授予学士学位，未毕业的学生则按其所学院系与地区，分配到各地大学继续读书。

对母亲的怀疑，在于南京临时大学有一个“文联同学会”的学生文化组织。1945年12月，昆明“一二一事件”发生后，形成了全国各地学生的抗议浪潮，史称“一二一运动”。在南京临时大学里就读的原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在中共南京地下党发动下，成立了“一二一同学会”，举行了反美示威，而我母亲原来所在的国立师范学生则集体加入了另一学生组织“文联同学会”，还参加了反苏大示威。反美是左翼学生的一贯做法，但当时为什么很多学生还要反苏呢？

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也就是著名的《雅尔塔协定》，以维持外蒙现状和控制东北铁路及军港为交换条件，换取了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八一五”东北光复，国民政府与苏联谈判，要求苏联撤军，但苏方百般拖延，不但称旅顺港及大连港、满洲铁路权益为苏联所有，还宣布东北154种工矿企业为苏联战利品，令中国国内舆论鼎沸，而苏军拆运东北厂房、机器的事实被披露后，更激起社会各界对苏联的不满。

1946年1月16日，国民政府经济部东北区接收委员张莘夫及其随员八人，前往交涉接收抚顺煤矿时竟被杀害，接着，《雅尔塔协定》内容公开，其损害中国主权的内容使举国震惊。2月中旬，南京临时大学5000多名学生走上街头，要求：“友邦军队依约撤退”“请求政府查究张莘夫被害真相”“坚决反对雅尔塔协定有损中国主权部分”，此次示威成为全国反苏运动的先声，随后各地爆发了一系列抗议示威，尤以重庆最为激烈，反苏中当然也包含着反共。

参加这一反苏大游行，后来成为很多人一生的“污点”，不断被审查，被要求交代。先父也曾因为在上海差点参加了反苏游行，生前就多次交代原因，直至改革开放后才终止。

对“一二一同学会”，母亲在交代里称不了解，但有些面孔熟悉，后来在华东局、在人民大学时曾多次见到其中一位姓康的女同学，曾任刘晓的秘书。刘晓就是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母亲还与南京临时大学同学王可玳相识，从1975年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和1978年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的审查看，正是因为认识了这位王可玳同学才导致了母亲不断被怀疑。审查称，王可玳是中统特务分子，“文联同学会”实际由王“控制”。由于参加了这个“文联同学会”，参加过反苏游行，再加上认识了这个王可玳，于是，母亲就沾上了中统特务的“嫌疑”。

我的母亲为什么还会被怀疑为参加过三青团呢？三青团就是三民主义青年团，是抗战期间官方组织的青年团体，那个时代的很多青年都参加过三青团，有的实际是集体加入，因而在江山易色后被长期审查。而我的母亲，其实并未加入过三青团，她只是在南京临时大学结束后等待分配的过程中，与我的大舅舅一道在三青团举办的一个进修班里进修过。

等候分配时，母亲非常焦急，因为家里生活拮据，又怕最终不予分配，无法继续求学。正巧我的外祖母有位从前的学生就住在附近，她的丈夫任职于三青团中央。我的外祖母听说三青团办了一个管饭又管升学的进修班，就托这位从前的学生代为设法，让我母亲和我大舅舅进入学习。进修班除了学三民主义，还学文史和数理化。在里面仅仅学了一个多月，母亲就接到国府教育部通知，被分配到上海暨南大学经济系继续就读。没料到，这一个多月竟成了母亲一生的“嫌疑”。

在交代中，母亲一件件叙述了暨南大学读书时的情况，如何加入的中共上海地下党，如何组织、参加了各种游行示威活动，如何被发觉，如何被通缉，最后，如何秘密离开上海，进入“苏北解放区”。后来，她先在华东局城市工作部训练班学习，继而又在华东局政策研究室和华东局办公厅任职。

1952年11月，母亲由上海进京，在中国人民大学第一期档案研究生班学习，研究专业是“苏联档案史”和“苏联档案工作的理论与实践”，导师是苏联专家谢列兹涅夫。1954年1月，母亲毕业留校后在历史档案系中国国家机关史和文书学教研室任教，直至文革爆发。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是母亲教学与研究的黄金期，她主编了《文书学讲义》，1981年又以《文书学纲要》的书名出版，还在专业刊物上不断发表论文，对“苏联机关文书处理中的监督制度”、“文书立卷”、“领导指导类问题的产生”等问题一一发表独到的见解。

其实，从1962年开始，因为心脏病不断发作，她已在家休养，还多次以身体状况和家庭历史问题为由申请调离档案专业，不料，文革的疾风暴雨来临，无情地将她抛了出来，以致一病不起。

八岁时偶尔认了个干娘、半年学习期间集体加入了一个学生文化组织、参加了虽然反苏却很爱国的游行、在官方组织举办的一个进修班学习了一个来月，如今想想，这些对青少年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可就因为这些，却让我的母亲一生不得安宁。

在母亲的交代里我还看到，原来早在1950年，当她在华东局秘书处任职时，就曾经赶上过一个小规模的运动叫“编年纪事”，虽然名称看起来挺有文化意味，但内容就是要求

所有人将自己的过去按照编年，一一交代清楚。母亲在这个运动中曾经将上述问题已经说了
一个遍，还做了检查。算起来，这点事竟让母亲反复交代了30年！

翻阅母亲的一页页交代，从发黄的纸张、繁体字，直到我们曾经非常熟悉的“最高指示”“万寿无疆”“万万岁”，每读几百字，我就不得不起身，站在阳台，极目远望，借以
舒缓压抑的心情。掩卷沉思，除了母亲生不逢时的感伤外，唯有一声叹息。

□ 来源：微信号《新三届》

~~~~~  
【国际风云】

一位美籍华人学者眼中1970年代的文革中国映像

• 萧 象 •

1973年美籍华人耶鲁大学教授赵浩生时隔25年之后以记者身份重返祖国大陆，进行了为期50多天的探亲与采访之旅。自1949年新中国建立，中美邦交中断，两国一直处在互为对峙的隔绝状态。直至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破天荒的历史性访华，中美签订上海公报，僵局方始打破，坚冰开始消融，双边关系由此趋向缓和，文化与经贸交流得以恢复。因此，赵教授是中美关系改善之后最早踏上中国大陆的得月者之一。一年后的1974年，赵教授以耶鲁大学教授访华团成员身份再次踏上大陆故土。两次访华归来，赵教授均激情难抑，笔写胸怀，撰述长文，介绍所见所闻，抒发故国观感，分别题以“中国归来答客难”、“二次中国归来答客难”发表于香港《七十年代》，并转载于大陆中国《参考消息》。

由于意识形态和冷战的阻隔，1949年之后的中国一直独立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之外，成为西方人意欲接近又不能抵达的“东方城堡”和不断猜测与想象的神秘国度。新中国究竟是如何的模样？20多年来中国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正在进行中的文化大革命又是怎么回事？对这一古老东方大国本来就抱有好奇之心的西方人，还有那些寄居海外的华人华侨，在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松动的利好形势推动下对中国（故国）的兴趣关注水涨船高，人们很想知道生活在大洋彼岸“另一个世界”中的中国人的现状，急于了解他们的真情实况。作为一种呼应，赵浩生将所见中国映像以文字形式再现于人们眼前。

“中国最基本的改变是公社制度。我们这次参观了很多公社，事实证明，公社制度已完全解决了八亿中国人民衣食的基本问题，公社制度已在中国根深蒂固，这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产品，绝非其他思想的政权所能实现的。”

“我这次在各地参加座谈、访问，看到工、农、兵和知识分子象在一个战壕中的战友一样，以知识和经验互相印证进行批林批孔的学习，看到各行各业在积极的进行着‘抓革命、促生产’的任务，看到各级领导干部轮流参加劳动，这种热气腾腾的景象和目前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萧条、社会不安的情况比较起来真是两个世界。”

“中国经过各种各样的运动，每一个运动，对这个革命的政党都发生消毒、新生、清除垃圾的作用。”“事实都证明搞运动不但没有打乱生产建设，相反的，是群众运动推动生产建设。我们在国内每到一处参观，负责人都清清楚楚的指出，文革前后和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前后生产数字的对比，可以证明思想运动对生产建设所发生的推动作用。”

“文革的成果和它带来的新事物的影响却是长远的。这些新事物包括教育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五七干校，赤脚医生，老、中、青三结合等，对中国都是‘好得很’！”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间是验证物事好坏（实践对错）的最终裁决。又一个25年过后，2000年赵浩生教授在撰述回忆录《八十年来家国》中论及文革时有这样一段文字：“在‘文革’初期，我还以为这是一个有利于国家社稷的变革运动，但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就越看越茫然了，只感到深深的忧虑与担心。”而作为见证这一节历史十分重要的记录，两篇“答客难”均没有收入书中的附录，收入附录的是写于改革开放之后虽影响不及但能立足脚跟的数篇关于中国的文章，悄然说明了作者的态度。

但人们仍不免会感到困惑，要提出问题：时在海外已多遭质疑和诟病的文革，在赵浩生教授眼中怎么会是如此一种令人向往的美好映像？理论一位长期生活在自由开放资讯发达社会的知识人，一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见多识广的记者，轻易不会对封闭的极权社会投以欣赏的目光，发出赞美的肯定。这是否因为文革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形态，当人们面对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时，有如面对一种陌生的新鲜事物，会因其新鲜而产生陌生的美感，因美感而混淆了视线，从而失去对这一事物真实而正确的判断？或者说，当人们看到一种从未见过的新生事物时，是否会被这一事物的新生表象遮蔽住视线，而丧失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能力？

让我们引历史上与此相近的案例试作回答。19世纪的美洲大陆，民主尚属一新生事物，托克维尔专程作客美国进行了一番考察，敏锐地感受到了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潮流，遂写出《论美国的民主》，正确预言民主的崛起是势不可挡的历史必然趋势。20世纪30年代，纪德应苏联政府邀请，对苏联进行了为期十周的访问，发现现实的苏联与想象中理想的苏联相差甚大，乃将真实记录苏联社会存在的包括个人崇拜、对外封锁、生活资料紧缺等种种问题的文章公开发表，名曰《访苏归来》；与纪德一样，罗曼·罗兰也在1930年代访问过苏联，写下了自己的见闻，虽然罗曼·罗兰将见闻的日记封存了起来未予发表，但几十年过后，其访苏日记重见天日之时，人们发现，他的看法与纪德大同小异。

托克维尔和纪德与罗曼·罗兰的故事告诉我们，一叶可以识秋，见微能够知著，人类的智者不会被事物的表象所迷惑，他们具有透过事物的表象直抵事物本质、判断事物好坏的能力，即便是走马观花的作客之旅，也能看出沿途风景的殊异，看出纷繁物事的真谛。那么，为什么赵浩生教授在1970年代却被中国文革迷惑了视线而看花了眼呢？

1920年赵浩生出生于河南息县，青少年求学时期受共产主义影响而表现左倾，抗战初期一度欲去延安因恐家庭反对而作罢；新中国成立后寓居海外时曾致函胡乔木请求归国而未成。其思想倾向由此盖可看出，不过我们若就此作为其认同文革中国的原因认定依据，不免会感到持论薄弱而碰到困难。因为思想倾向虽然可施予人的行为以影响，但并不决定事物判断的能力。托克维尔是贵族，罗曼·罗兰是苏联的同情者，纪德更是共产党员，他们做出的观察与判断却并不同向甚至反向于其思想倾向。判断决定于理性，理性可以克服倾向。毫无疑问，在赵浩生思想倾向的背后更有一种深刻而决定性的因素，左右了他的理性观察，影响着他的智性判断，从而使他做出了对文革中国毫无保留的认同。这是一种什么因素呢？这是民族情感与家国情怀。

19世纪中叶以降，老大中国积贫积弱，国势日颓；至20世纪上半叶，军阀混战，强敌入侵，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生长于这一时代与背景之下包括赵浩生在内的中国知识人，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刺激下生发出一种极为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和炎黄爱国情。渴望国家的强大统一，期盼民族的重振复兴，想见中华巨人般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仅成为他们孜孜以求的人生愿望，也如同宗教一般成了念兹在兹的具体人生内容。因而当有朝一日祖国以强大

统一的面貌出现在他们面前时，比起民主自由的选项，自会受到更多的欢呼与拥护。而对赵浩生这些去国怀乡的华人华侨而言，由于长期浮悬海外，漂游异乡，乡愁伴随着乡情，民族情感与家国情怀往往表现得更为明显，也更为深厚。

因此，当赵浩生踏上阔别几十年的故土，看到政府为他的归来专门修通了从信阳到息县的公路，看到县城万人空巷争睹游子归来的动人场景，看到自己甫抵北京就被周恩来总理邀请参加国宴，当然，更看到了沿途目睹的二十多年的社会变化——去国之前山河破碎、兵荒马乱与当下国家统一、人们安居乐业的巨大反差——所有这一切都足以让他深深地感动，而感动的泪水也一次又一次地模糊了他的视线。于是，在强烈的民族自豪与家国情感支配之下，固有的左向思想得到鼓励膨胀，他再也无法透过婆娑泪眼而看得更深更远了，他把眼前所看到的一切——人民公社、教育革命、上山下乡、五七干校，全都当做了这个民族社会改革的自豪的象征，看成了这个国家制度创新的未来的发展方向，而予以全盘接受，并进行热情赞美。

赵浩生教授对林彪事件独家新闻报道的放弃，就是这一情感对理性思维支配证明的最好诠释。访华结束离开大陆前夕，有关方面接待人员将林彪事件的一些细节内容告诉了赵浩生，赵浩生认为这是一条重大新闻，虽然美国报纸有过一鳞半爪的报道，但都没有这么详尽，一旦发表，必是震惊世界的独家新闻。就在赵浩生准备好把此一消息交给报社发表之际，一种担心此举可能会“给大陆带来负面影响，甚至伤害”的想法改变了他的注意，使他放弃了一次发表重大独家新闻的机会。其实他自己也知道国内既然把内情告诉了他，说明已不是什么国家机密，发表也不存在问题，但一种维护祖国形象的民族情感自觉，还是令他做出了反向于职业精神要求的忍痛割爱的让步选择。

一种情感，无论怎样的美好，当它过于强大而将一个人包围时，必会造致这个人理性判断的偏差，而陷入认识的迷局。这就好像恋爱，当一个人跌入情网而迷上一位美人时，连美人的狐臭也会嗅做芳香的。赵浩生自是把祖国美人身上发出的文革狐臭当做芳香而迷吸了，以至于将封闭自锁所造致的孤立的经济形态，也视为“完全是自力更生的果实，既无外国机器，亦无外国资金，绝不仰人鼻息”而盲目予以称赞，并顺便把台湾的经济发展予以了否定，认为“其本质还只是一个殖民地经济，还是一半美国一半日本式的经济。”有趣的倒是，数年后，中国改革开放，赵教授毅然辞去耶鲁教职，专门担任某跨国公司对华贸易顾问，不遗余力将“殖民”的资本主义经济引进大陆。

当然，我们知道，不同于当时大陆那些遵命或违心之作，赵教授以文字再现于文革中国影像时，他是爱国情感激动下的自由写作，其发自肺腑的赤子真诚也烁然可见。然而，我们又不能不说，在对社会现象进行观察并作出判断时，仅仅真诚并不能抵达真实，尤其是为某种情感或情绪所支配而理性缺席，失去了审慎的怀疑与批判时，真诚很可能膨化为虚妄的自以为是，纵然自由的写作也会滑向盲目的不由自主，与真实背道而驰；而且这种写作的迷惑性更大，更需要加以辨析。

这不由让我们想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坛的前车之鉴。1959—1961年中国发生过一场持续三年的大饥荒，结果导致数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然而作为社会生活反映的当代文学这面镜子里，人们竟然见不到任何有关于这场饥荒的映像。并不是作家们停止了写作，相反当时最优秀的作家和诗人们此一时期创作了大量诸如描绘美好生活的《荔枝蜜》、《花城》、《桂林山水》、《长江三日》、《乡村大道》和《蓬莱仙境》等等作品。这些作家和诗人们创作这些作品时同样怀抱一种发乎内心的对时代和生活赞美的真诚，但这种没有独立思想与人文关怀的真诚，却在一场重大社会灾难现象面前选择了沉默，置惨象与苦难

于不顾，视民瘼与民生于无睹，没有表现出文学应有的功能，完全失去了文学反映社会的全面而深刻的真实。

大饥荒之于中国文坛的虚空映像与文革中国之于赵浩生的变形映像，在社会事物与人的认识问题上，可谓异曲同工，殊途同归；惟不同者，前者为一种意识形态所致，后者因一种民族情感与家国情怀所为，它们留给世人的是同样的发人省思与耐人寻味。

2011-10-25

□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

【往事非烟】

陈毅批判会纪实

• 王宗禹 •

（作者简介：王宗禹，1950年生人，文革时在北京二龙路学校高一（2）班，1968年12月去山西插队，1972年12月去大同矿务局当矿工。1978年考入中国矿业大学，毕业后在煤炭科学研究院做技术工作，高级工程师。1997年开始在煤炭科学技术杂志做编辑，后来在中国安全科学学报做副主编、编审。）

不是想说明什么，只是把经历过的如实地记下来。

1967年，文革开始的第二年，那时我在北京上高一。8月上旬的一天，别人给了我一张票，说是到人民大会堂开陈毅的批判会，晚上7点开始。我早早就到了，大会是北京外国语学院造反兵团组织的（准确名字记不清了，反正是“北外红旗”的对立面）。会场气氛很热烈，到会的大都是大学生，作为中学生的我悄悄地坐在角落里看热闹。

开会的时间到了，主持会的是个穿白衬衫的小伙子，肯定是个头头，口才很好。他说，周总理答应来参加这个会，但是今天很忙，当然，总理一贯很忙，但是今天特别忙，实在脱不出身，他委托李富春同志代表他参加这个会（李富春当时是政治局常委）。我这时才注意到主席台上的人里有一个光头很亮的瘦小老头。

1966年11月13日下午，总政治部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全军院校十万余来京师生大会。陈毅在会上为文革泼冷水

主持人又说，我们欢迎富春同志来参加这个会，但是我们希望中央文革的江青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也来参加我们的会。我们正在和中央文革联系，等他们来了我们再开会。下面一阵轻微的骚动，中央文革会不会来人，什么时候来都不知道，只好耐心地等。可怜李富春堂堂政治局常委，被这帮学生晒在那里。

学生乐得在有空调的人大会堂里，比外面三伏天的燥热舒服多了（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空调）。有的人干脆睡起了大觉，有人在嘁嘁喳喳聊天。我惊叹于这些毛头小伙子的学生头头竟然可以直接和周总理、中央文革通电话。

大约过了二三个小时，会场前面一阵骚动，会场情绪一下起来了。一伙人簇拥着一个穿军装的人上了台，我一眼认出那个人矮胖，戴黑边眼镜，是陈伯达，另有几个随行的人也穿军装。有人在喊口号：“向伯达同志学习”“向伯达同志致敬”。会场气氛一下热烈起来。陈伯达一边走一边脱去草绿色的军装，穿着雪白的衬衣。主持人一下亢奋起来，马上宣布开会，先请伯达同志讲话。

陈伯达的闽南普通话已经大有进步，一年前我听过陈伯达讲话，一般人根本听不懂，还要文革小组的王力做翻译。陈伯达先表示对这个大会的支持，说你们成立的什么什么批陈联络站就很好嘛，旁边的学生小声更正他说的联络站的名字。还说了些冠冕堂皇的话记不清了。讲话中间不时被学生“向中央文革致敬”一类的口号打断，气氛很是热烈。

陈伯达口气一转，说我向小将们提点意见好不好。没等学生反应他就说，周总理是支持你们这个会的，因为太忙来不了，委托李富春同志代替他来，李富春同志是政治局常委啊，你们完全可以开会了。可是你们非要我们中央文革来人才开会，这样做很不好，是对我们的要挟，我给你们提这点意见能不能接受啊？

讲话中间有人照相，闪光灯不断，他说，不要给我照相，我长得又不好看，引起一片笑声。最后说给你们提点要求，今天我在这里讲了几句话，明天不要大字报大标语上街，什么“伯达同志讲话好得很哪！”我讲什么了就好得很呐。然后就起身告辞，一帮人簇拥着离开。陈伯达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前后也就十几分钟。

主持人马上宣布批判会开始，这时才发现，陈毅已经站在台上左角了。上身穿的军便装，没有领章也没戴帽子，微低着头。站在一个讲台后面，讲台上有个话筒。有人开始喊口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有喊“打倒陈毅”的，还有喊：“陈毅不投降就打倒他”。

一个男学生走到舞台正中的讲台开始发言，发言的主题是，文革初期北京外国语学院一些学生贴大字报反对驻校的工作组，陈毅派了警察晚上在学校外面巡逻，罪名是镇压学生运动。发言是照着稿子念的，声色俱厉。

发言到最后，男生大声喝问陈毅：这些警察是不是你派的？陈毅回答也很痛快：是我派的。问：你是执行谁的命令？陈答：“我是秉承刘少奇的黑旨意”。感觉陈毅真是个爽快人。

后面发言的主题是陈毅整陈伯达的黑材料，滔滔不绝讲了一大通，最后喝问陈毅是不是承认。陈毅说，当初外事口的张彦整的陈伯达的黑材料，拿给我看，我认为他是在挑拨我和伯达同志的关系，这些材料我看了以后交给周总理了。

对于陈毅的辩解学生似乎一时不知怎样应对，于是就高呼口号“陈毅必须老实交代”“打倒陈毅”之类的。陈毅又说，我知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狡辩是没有用的，你们不信可以去问周总理。这个回合学生真有点语塞了。于是就用喊口号掩饰尴尬。

下面有一个发言主题是揭露批判陈毅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陈毅以前当过对外文委主任，发表过不少对外国文艺、文学思想的讲话，各种场合讲的，林林总总还真不少，搜罗到一块，按照当时标准，上纲上线，几乎每句话都有问题，不是资产阶级的就是修正主义的。发言人慷慨激昂，发言还没有完毕陈毅就插话了：“批得好！批得痛快！”

还有些别的批判主题，已经记不清楚了。大会结束时请李富春讲话。李富春的口音也比较重，但是还能听得懂。他讲话倾向性很明显，他说陈毅同志有错误应该批判，这是毛主席，周总理都同意的。你们喊的口号里有一句“打倒陈毅”我不能同意，另一个口号“陈毅不投降就打倒他”，我看比较合适。

事情已经过去50年了，那一段历史确实不该忘记，趁着脑子还清楚写在这里，供研究那段历史的人参考。

□ 来源：微信号《新三届》

~~~~~

【亲历者言】

武汉地区文革初期的“五十天”（下）  
——《武汉地区文革纪实》选载

• 杨道远 •

（上接 z k 2 0 0 6 c ）

### 第三节 “按一九五七年反右的规格”整群众

武汉地区6月的文革运动，按照王任重及湖北省委的规划，“以武大作为试点，取得经验，逐步展开”。省委于6月8日向武汉地区的大专院校和省属文化机构派出文化革命工作组。10日，武汉市委向30所完全中学、106所初级中学、武汉师范学院、市文联、市杂技团派驻工作组；随后，省市委向武汉地区的厂矿企业派出工作组。

6月初，省委集训即将派往各院校的工作组（队）组（队）长，6日至10日，王任重作了三次讲话。他说：“文化革命是全党的事，工人、农民的事，运动的打击锋芒主要是知识分子。”“学生中极其反动的要斗，猖狂的要交给农民管制。”“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诬蔑党的组织，丑化党员、团员、积极分子和党的领导人”，就划为右派〔6〕。

6月8日，王任重在全省文化革命工作会议上讲话，要求将1957年省委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几点意见，作为当前文化革命运动的指导精神。王任重后来说：“在6月10日前后一次中央会议上，刘少奇提出‘这次运动可能和1957年差不多，要打击三、四十万个右派分子’，这个想法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我是用1957年反右斗争的老经验来指导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的。”〔7〕

6月上旬，在学习五一六通知的武汉市委扩大会上，宋侃夫说：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文化、教育部门和企业的财会、技术、业务部门，是整知识分子集中的部门〔8〕。

6月18日武汉市委发出的《关于文化大革命当前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说：“以左派为骨干，把革命的阶级队伍组织起来。对群众队伍要进行阶级分析”。“首先把左派划出来，作为依靠力量。……然后把右派找出来，是孤立和打击的对象。剩下的就是中间派，是争取、团结、教育的对象。”〔9〕

6月23日，省委书记处书记许道琦在一个会议上说：“有些学校反击了，不要反击过早，反击过早，大坏人就会跑掉。……先让他们放。今年牛鬼蛇神放得不多，教师放得不多。”〔10〕

26日至28日，省委集训将要派到高校参加工作组的工人。许道琦说：“学校的文化革命有两个阶段，头一大段就是反右派，夺取领导权；第二大段搞教学改革，彻底改革教育制度。”〔11〕

文革一开始，市委组织部长、武汉市四清工作总团文化分团团团长辛甫在所属各工作队队长会议上说：“这次全面鸣放，要‘引蛇出洞’，老右派有经验，不容易引出来，新的没有经验，好引，要尽量让大家放，越乱越好。”6月19日辛甫在市文艺界文化大革命代表会上，动员上下左右一起烧，挖程云黑帮的爪牙、黑线、黑根，要“斩草除根”，“文艺界可以不受比例限制”〔12〕。

7月3日，王任重在给湖北省委常委的信（后被称为“七三指示”）中说：“大暴露好得很，差不多牛鬼蛇神都出来了。引蛇出洞好打，是还击的时候了”。“首先打击最猖狂、最凶恶的敌人，即首先打击多数群众最痛恨的敌人。这样才便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这些人，有的是学校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所有的学校都是这些人），有的是干部、教师，或大学生中的反革命分子，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抓住根挖下去，把上上下下的根子都挖出来。水院可以把最坏的右派学生揪出来集中地斗，打掉他们的气焰。”〔13〕王任重说这封信“毛主席看过了，没有意见”。对王任重的这一说法，张体学在1968年的一篇文章中说“他利用毛主席的崇高威信，欺骗干部，推行他的黑货”〔14〕。

王任重在这封长信里明确提出“反右斗争”这一概念，通篇都是围绕普通群众中的“左派”“中间派”“右派”展开对文革运动的部署。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8月25日，刘真在北京见到他，“他还念念不忘‘反右派’”。王任重还对刘真说：学生中右派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内〔15〕。

王任重在这封信里提出的“引蛇出洞”“枪打出头鸟”和9月初在清华大学提出的“秋后算账”，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让武汉地区的少数派（后来称造反派）吃尽苦头。文革期间造反派可以谅解直接出面打压他们的张体学，但一直坚决要打倒王任重。

7月6日，省委常委开会讨论王任重7月3日的来信，王任重说：“作为右派分子斗争打击的不超过百分之三，学生中搞百分之一。武汉市大专学院五万人，合起来才百分之一、二，也许百分之二。中学生一般的不划右派，毕业班特别突出的，经过市委批准可以当右派打。干部、大学中要反右派。……相当于高中的按高中办，高中三年级，少数特别反动的要反右派，其他的是反革命分子按反革命分子办，是流氓按流氓处理，该逮捕的逮捕，该开除的开除。工人里一般的不搞反右，是反革命按反革命办，是贪污盗窃按贪污盗窃办，还有一种坏分子。……按一九五七年反右的规格，是什么按什么处理。各学校、机关把左派组织起来，注意保卫工作，注意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行凶杀人，负责监视的要拿着棍子”〔16〕。

按照王任重七三来信的精神，省委7月7日发出《关于在中等以上学校进行文化革命运动的意见》。王任重七三来信的重要段落，一字不差地出现在这个省委文件中。文件指出，“反右斗争基本结束以后”，“转到以清思想为主”。因为“不仅中间派有错误，不少左派也有某些错误观点”。清思想“采取整风的方法”，即“领导带头，左派带头，洗手洗澡，



批评自我批评的方法”。按照王任重和省委关于文化革命的部署，群众中的右派要反，群众中的中间派、左派也要整。

6月1日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发布，6月8日开始工作组陆续进驻各单位，首要工作就是召集“左派”开会，对本单位所有人按左中右“排队”。针对具体人和事的大字报开始代替表态性的大字报，有群众自发写的，更多的是工作组和党组织布置“左派”写的。自发写的大字报只要涉及主要领导干部，立即遭到各种形式的打压。“左派”的大字报一般是翻出“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的老账，揭露“落后分子”的“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很多“左派”并不知道的材料，由党组织提供；当事人自己不说谁也不知道的事，出自他们“向党交心”（17）时的自我交待。

水院发生抛出“交心材料”而致人死命的事：

张廷英老师，1963年从苏联留学回国，曾经诚恳地向组织交心，承认自己对苏共有过模糊的认识，对修正主义有过幻想，希望得到组织的帮助。1966年6、7月，他的交心材料被院党委和工作队抛出来，把他作为“修正主义苗子”来批判。在有组织的整墙大字报的围攻下，他数次找工作队党委申诉遭拒，加上他的妻子无法承受高压而反戈一击，揭发他在家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于是他在绝望之中独自进入办公室，用刮脸刀片割开颈静脉自杀，血流满地，惨不忍睹。他成为水院最先的自杀者（18）。

湖北大学法律系专案工作组8月15日公布《关于杨清桂问题的初步材料》（杨清桂为该校伙食科副科长），这份材料的“说明”第一条写道：“关于杨清桂的一系列反动思想的材料，均是杨在58年前后向党交心，或学习文件时思想检查的底稿，有些是‘四清’运动中自我交待的。”

市二十八中六七届高中生刘中秋也讲到“交心材料”：“舒先生和其他老师的一些所谓政治、思想问题，学生怎么会知道的呢？这是因为校方的提供或‘泄露’。校方如何掌握这些情况的呢？原来，当时有一种官方倡导的活动，就是‘向党交心’。本来，向党组织反映自己的一些想法，求得党组织的指点以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未尝不是好事。党组织也是这么讲的。我校普通教师都把自己的各种想法写在材料纸上，交给了党总支。”（19）

可能是受到北京揪出邓拓三家村、湖北揪出李达三家村的启示，各单位工作组都热衷揪“三家村”，人数达四人就称“四家店”，再多就叫“反革命集团”。武汉测绘学院航空摄影测量系学生党支部的三个支委都是调干生，一向被系党委认为“不听话”，文革一开始就被打成“三家村”。后来又整支部里另一个党员调干生，“就把他们一起称之为‘四家店’”（20）。

6月6日，王任重之子、武昌实验中学初三学生王三宝和另三个同学贴出该校第一张大字报《我们就是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矛头指向教师，说武汉市的教职员中百分之四十出身于成分不好的家庭，各校学校主要领导人出身不好的达到百分之四十八。柳英发回忆：大字报说实验中学的三位青年教师高宏、廖起蜀、张庆圭是“三家村”，这三位教师当即被关进一个小房间，还强迫他们将头部伸出窗外“示众”（21）。

6月中旬，武汉一中校园里贴满了针对教职工的大字报，个人历史、个人生活上的“问题”“污点”被公之于众的老师们顿时在学生面前抬不起头。一天，英语教师李德辉原工作单位——市新华书店的几位“左派”，来一中贴出大字报，揭露李一些不检点的言论并上纲上线。当天工作组召集全体教师开会，没有通知李德辉，几个小时后李德辉跳楼身亡。一中

工作组长、市教育局副局长刘建国当着围观师生的面，指着口吐血沫、尚未咽气的李德辉说：“现行反革命！”（22）

武汉测绘学院六一级学生杨道远回忆：6月开始搞文化革命，四清工作队就在学生中排左中右，打“右派”、抓“小邓拓”。武测党委第二书记张肇翼保护学生，据理相争，被张体学定为“黑手”、“右派”，并对其进行批判。测绘专业在国民党时期归属军队，有点资历的教师都有军衔（在武测当时的教师中有国民党少校、中校，还有两个少将），这些有国民党军衔的教师都定成历史反革命，进驻武测的工作组矛头对着普通干部、教职工，抛历史档案材料，把一批老教师、教授打成“黑帮”、“牛鬼蛇神”，批斗28人，被逼自杀6人。

湖北大学六五级学生杨胜利回忆：文革一开始，“学校开始布置在学生中抓反动学生，政治辅导员们空前地忙碌了起来。……全校（或全系）召开了一次批斗大会，对一个姓龚的学生进行了批判，原因是这个学生家庭出身不好，他企图为他的家庭出身翻案。这是一个信号，学校开始收集整理学生的材料，着手在学生中划分左派和右派。我的两位高中时的同学，一个是统654班的孙似虎，一个是计651班的龙诗易，出身都不错，从高中到大学，一直都是学生干部或团干部，却不知道什么原因，分别都被他们的政治辅导员划为假左派真右派或政治上有问题的人，被悄悄地收集整理了材料。”（23）。

湖大工作组组长曹金祥在各班核心小组长会议上布置工作，核心就是“反右”：“根据当前的情况，要积极准备，很快转入全面的反右派的批判阶段……大致是七月二十五日到八月底为反右斗争，八月底基本结束。这一阶段，是集中力量，反击右派，这一点在思想上要明确。”“搞了李光斗的问题，紧接着就把各系的右派拿出来搞。学生中的右派，放到最后搞。”“左派中还有不纯的现象，也还有的左派没有组织起来，要重新审查。对于右派，这次跳出来的就抓，没有跳出来的就挖，要挖得准，挖得深。”（24）

武汉三中工作组组长陈某（市法院刑庭庭长）在大会上说：文革就是四清的继续，方法与四清一样，群众之间背靠背、面对面揭发“三反言行”（25）。

7月上旬，辛甫对市京剧团工作队说：“京剧团一九五七年在×××领导下反右派很不彻底！”“文艺队伍很复杂，要彻底清理”。京剧团工作队在群众中搞“追根”“翻箱倒柜”，搞得人人自危（26）。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党委在“左派”会议上多次强调：目前的形势是省委领导所说的“1957年加1958年”。水院党委对文革的理解，代表了文革初起时各级党组织和工作组的普遍思想。湖北大学党委书记赵抱一也说：“这次运动是1957年反右斗争的继续。”（27）

水院党委副书记张弗承在讲这句话时没有发挥，也未解释。水院团委主持工作的副书记张建成当时的理解是：“右派分子将利用文革之机向党进攻，我们要有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所以要摸底排队、整材料，以备反击右派时使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后，第二年开展向党交心运动，人人过关，交待自己的思想活动，特别要说清在右派猖狂进攻时的思想与态度。这样估计形势是要告诉左派，要立场坚定，在运动中少说话，多观察动向，准备反右派。”

水院党委在工作队进驻前就布置“左派”抄录“有问题”的大字报，对所有学生进行摸底排队，划分“左中右”。“对有问题的人，要整材料。平时的言论、行动都要写入材料

中，可以从‘四清’运动中‘割尾巴’时自己的交代材料中找有用的东西，以便下一步运动需要时用。”“在排队时，要分院重点对象、总支一级的对象。要控制人数，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学生每个班级在3个人左右，则全院在250人左右，大约占学生总数的8%。”

6月14日晚，水院党委、各系总支召开的一连串“左派”会议的情况传播开来，情绪激动的千余学生聚集，要求一系总支书记出来澄清，在场“左派”学生说写大字报揭露此事的同学是“造谣”。同日晚，“左派”学生抄大字报时谈论“反右”“秋后算账”一事，引起另一处学生聚集。随后，听到“左派”谈论抄大字报是为“反右”做准备并予以证实的蒋继清同学被“看管”起来，班核心小组（原班团支部）要他“老老实实地交待自己的问题”。站出来证实院系“左派”会议情况的郭明正，本是班核心小组副组长、贫农子弟，与同系学生任乾健一起被打成“任一郭反革命集团”，而写大字报批评院党委和工作组的任乾健与郭明正素不相识。王任重任在省委文革小组办公室编《文化革命动态》上看到郭明正等的情况后批示：“此种人应拘留起来，几个最凶的右派还不打击一下吗？”“水电学院这些坏人已经出来了，这里应该反击了！把这些坏分子的真相公布出来，然后看管起来。”〔28〕7月17日，水院工作队党委召开批判“任一郭反革命集团”暨公捕“杀人犯”郭明正大会，省公安厅当场逮捕了被诬为“杀人未遂”的郭明正（关押108天后释放）。

除了“任一郭反革命集团”，水院学生中还揪出一个“徐海亮—晏成禹反党集团”，党委副书记张荊承在批判会上说“徐海亮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当时水院有三个系，这两个“集团”分属一、二系，三系的“反击”对象是学生李光文，罪名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极端自由主义”。这三个“反击”对象是省委书记处书记许道琦确定的，6月17日由工作组传达。

武汉水院党委认为文革是又一次1957年反右；6月11日进驻水院的工作组发动大揭大批，目的是让右派自己跳出来。7月9日，按照王任重的指示，省委副秘书长刘真率领工作队进驻水院，取代原工作组领导水院运动。刘真说：“我是带着‘反右’的任务来的。”一周内，全院公开点名批斗的师生达一百多人。五十多天“反右”的结果是：被迫自杀二人，逮捕一人，揪出学生中的“反革命集团”“反党集团”各一个，点名批判一百多人；内定“右派”两百多人，被看管三百多人；郭明正所在班一半以上学生被打成“右派”。封了一批“左派”，斗了一批“右派”，此后势不两立、争斗多年的保守派、造反派就是这样开始形成〔29〕。

6月11日，工作组进驻华中工学院。“进校不到十天，就内定了学院内有三百八十三人为右派”〔30〕。

胡成荫当时在动力系任政治辅导员，2008年他回忆：

六月中旬，我按省委工作组的安排，到学校东边和西边的学生宿舍大字报栏，到各系实验楼的大字报集中地区，认真看大字报，并简单记录以利于分类归纳问题。我发现大字报的指向都是一般群众，一个30人的学生班揪出的小爬虫、小“三家村”有六七个人；警告××孝子贤孙，要老实规矩夹起狗尾巴；一些平时敢于讲话、意见比较多的学生，就是什么“喻家山夜话”小集团，这是套用“燕山夜话”来扣在学生头上的大帽子。在实验楼的大字报中，除了上面这些当时的时新帽子外，更多的是教职工们不堪的历史和往事，例如三青团的忠实走狗、刮民党的奴才……。这里很多都是人家交代的材料，是解放后历次运动中对党和人民忠诚交代出来、已经做了历史结论的，而且绝大部分都是一般问题。我一面翻阅记录，一面翻报纸上刊登的中央首长讲话，周恩来总理说我们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

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要指向那些反动的学术权威，使我们国家不变色。……这是当时湖北日报刊登得明明白白的。可我们学校内这大量的大字报的矛头，哪里是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哪里是指向反动学术权威呢？

工作组长王耀（襄阳地委副书记）曾交代胡成荫“发现问题随时反映”，于是胡成荫向王耀汇报说：“大字报很多，轰轰烈烈，每个学生班点名上大字报的学生有八九个，占学生班人数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在教师中各教研室点名批判的人数和学生班的比例差不多。这种情况和……把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的学术权威的指示精神不符合”，王耀打断胡成荫说：“你懂什么！现在是反右的前哨战，华工的右派多得很”。

6月21日，王耀在师生代表会上说：“干部、教师、学生中都有右派，要揪出来反击。”“学生中为什么不整？五七年不是整了？读大学反党反社会主义要他做什么？”“再发展一周或三天，就和五七年一样了。”工作组整学生、学生斗学生就这样开始了。29日，赵文成、胡成荫等八人贴出大字报《对当前运动的几点不同意见》说：当前我院运动“矛头对向群众”，不符合二十三条及人民日报社论精神，不应该“把战斗小组一律取缔”。王耀对赵文成说：你是真共产党员，还是假共产党员？你们想要我们按你们的办法干革命办不到，你们想要我们抓住一个朱九思（院党委书记）而放走学生中的一大批资产阶级孝子贤孙办不到。王耀对学生干部说：“对赵文成大字报的态度，是区别左中右的标志之一”。赵文成和赞成他的人被打成“假左派、真右派”，“野心家”，遭到成千上万张大字报围攻，被盯梢、监视。赵文成和支持他的政治教研室教师张汉卿被撤掉院机关文革领导小组成员职务。

华工的学生斗学生，从6月23日延续到7月26日。7月下旬，院工作组布置“落实材料，准备斗争”，被系统整理材料的有380多人。在三系，工作组提出口号：“上下一扫，把水搅得浑浑的，胖头鱼、泥鳅、蛤蟆一起抓。”该系五年级191人，被“揭发”的有38人。工作组成立直接掌控的保卫小组，其职责就是监视一部分同学。据后来少数派抢出来的所谓“黑材料”显示：这些同学每天穿什么衣服、干了什么事、开会时是否鼓掌都有记录（31）。

华工工作组在整学生的同时，对干部和教师实行“打击一大片”。红司（新华工）反修兵团调查小组《省委工作组在我院推行刘邓干部路线的调查报告》（32）记载：

工作组到处散布说我院是“两面政权”，说“学校党委有反革命集团”，“党委烂了，各级党组织也烂了”，“从院到处、系直到科室都有黑帮、黑线”。说×××系的党支部“除一两个人外，都坏透了”，“要是有什么情况，你们党员中有几个能跟党走？”说××教研室“找不到一个好人”，××科“是清一色的坏人”等等，甚至连过去受过表扬的积极分子都被说成是“朱九思的红人”，说“从前的红人模范都是今天的麻烦”。工作组故意耸人听闻，在群众中造成“干部都烂掉了”的印象以后，于是进而提出“上下左右一齐扫”，“大的小的一齐扫，先扫大的，后扫小的”等口号，还说“当权派没有几个好家伙”，“要把总支书记以上的干部全部换掉”（当时省委也确实准备派几十名干部来我院实行领导干部大换班），说“有的单位要全面夺权”等等。

工作组还把老师都下到学生中去，并向学生“交底”，挑动学生整教师。据动力系统计，全系一般教师中被揭发47人，占22%。307教研室教师被揭发的达12人，占59%。303教研室教师被揭发10人，占34.4%。

武汉锅炉厂职工孟运通6月13日晚写出一张大字报，批评陶铸在广州的一次讲话是制造清规戒律，不准群众革命。第二天上午孟运通被厂保卫队关押，持枪看管。在厂工作队发动下，“空中的广播、地上的批判专栏、地面的标语组成了立体作战的强大火力网”。

同时，“工作队、厂党委出于十七年以来的思维惯性，根据省、市委抓右派的精神，把厂里职工划成左、中、右，调动可以信任的骨干分子，密切注视可能的捣乱者的一言一行，搜集挑战旧秩序、危及当权者利益的那些人的所谓材料，动员大家背靠背地检举，真是弄得满厂风声鹤唳。”三位普通工人因此自杀。机动科工人谭文元“因为家庭成分问题，被工作队找去谈话，要他挖思想根源，交待反动言论，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谭文元顶不住压力，上吊自杀。“阀门车间一位老工人……也是工作队找他谈话，要他交待历史问题和攻击‘三面红旗’的罪行，声言要召开车间大会批判。他害怕了，……上吊自杀”。“不久，三一四车间一位上海籍老师傅因恐惧而自杀。”

工作队在机动科抓出一个“三家村”：一位是厂副总机械动力师，曾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集体加入国民党；一位是出身不好的女技术员；一位是从事俄文资料翻译的技术员，一贯被认为“只专不红”。为找到证据，积极分子去俄文翻译的房间“撬抽屉、翻皮箱，从他的私人信件中找问题，凑成材料，断章取义，整理成‘黑话录’。这种非法的鸡鸣狗盗的行径干了两次。”〔33〕

四机部中原机械厂是宋侃夫抓的点。早在1966年5月，宋侃夫指示驻厂工作队：“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主要是搞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中原机械厂技术队伍很复杂，排排队，准备几个尖子人物搞一下，把技术队伍好好整顿一下。”6月12日，该厂群众给工作队贴大字报，工作队组织围攻，宋侃夫说：“反击太早了，还应该让他们多暴露暴露才好”。7月，宋侃夫认为蛇已引出洞，指示工作队：“运动向纵、深、宽方向发展，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哪里有问题就扫到哪里，上下左右一起扫”。以对工作队党委的态度为标准，二十天左右“扫了”三百多人〔34〕。

文革初期，所有人的所有举动，都必须按照党组织和工作组的统一部署，指到哪里打到哪里，否则就是“不要党的领导”。

6月11日，一冶第一子弟中学教工团支部书记管典芬和一位学生干部召集部分团支部书记开会，认为校领导捂盖子、定调子，阻挠学生写大字报，决定成立“行动小组”，自己组织起来投入运动，同时派代表到省委反映学校情况。这件事被校党支部汇报给一冶党委，一冶党委认定为“反革命事件”。第二天，一冶党委请示省委得到同意，向一冶一中派出近百人的工作组。工作组成员进入各教学班控制学生，教师集中学习，每个人的发言都被记录下来。工作组查阅教工档案，结合现实表现分出左中右。同时宣布管典芬等人是“现行反革命”，发动全校批判〔35〕。

1967年2月省直机关造反派揭发：省委文革小组办公室编《文化革命动态》反映一冶一中有师生自行成立“革命行动小组”，王任重批示：“这不是反革命吗？坏人暴露出来，好得很！”“明令宣布解散行动小组”〔36〕。

6月13日，武汉地区的报纸、电台公布武大揪出“珞珈山三家村”的消息，武汉工艺雕刻厂工人胡国基当天自发写大字报要求前去声援，厂里很多人在大字报上签名。厂工作组立即抄录大字报和签名者名单，找签名者一一谈话，说胡国基的大字报“有反党的倾向”。随后大多签名者将自己的名字划掉或撕去，其中有人贴出大字报声称自己“上了阶级敌人的当”。工作组组长对胡国基说：“你这种自发行动是党所不允许的，你是在煽动闹事。”工

工作组开始审查胡国基，公布了他的档案，发动全厂职工批判他，厂里贴满了批判他的大字报，说他是“反革命”、“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自发声援武大是政治扒手行为”，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胡国基“蒙了”：党的报纸、电台都在报道各界群众积极声援武大，“怎么我写大字报要求声援就错了呢？”不久他明白了，响应党的号召也应该有组织、有领导地去响应（37）。

6月中旬，中学文革运动开展起来，一些中学特别是只设初中的中学出现过激行为。7月16日，中南局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办公室蔡刚电话传达王任重关于对待青年学生问题的几点意见，其中谈到中学生问题，他说：“中学生右派分子，是指那些流氓学生打人、行凶、搞现行破坏活动，这样的人要逮捕法办。但这种人为数不多，而且其家庭大多数是五类分子。”宋侃夫在关于安静街中学、民权路中学等的“情况反映”上批示：“流氓活动这样猖獗，无产阶级专政到哪里去了？”。从6月16日到7月27日，武汉市委以“打击流氓”的名义，在39所中等学校逮捕学生159人（38），近千人按市委布置在校内进行批判斗争。王任重说：“捉一千也不多。”（39）宋侃夫还决定：“对那些年纪大、成绩差、有流氓习气，但又不够拘捕条件的学生，在家长同意下，送到东西湖农场去强制劳动。如果他们不去，可以派武装押送。”（40）逮捕“流氓学生”时各区开公捕大会，组织各中学被划为“右派”的学生、给领导写过大字报的学生前去“受教育”。

市三十六中工作组在校内关押了二三十名学生，7月18日、25日该校四名学生分别在公捕大会上被逮捕。章宏发，16岁，罪名四条：一、“反党反毛主席”（写大字报“十评工作组”，喊“炮轰工作组”）；二、“盗窃国家机密”（诬陷章偷一教师的工作手册）；三、“撕大字报”（一女生写一位男教师要流氓，未写完被章撕掉）；四、“流氓成性”（章有打人骂人习惯）。章于8月18日释放。邹人杰，17岁，平时比较调皮，玩球无意打坏一支日光灯，被说成“有意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邹于10月31日释放。尹定波，平时比较调皮，于8月18日释放。罗先觉于8月25日左右释放（41）。

6月以来，武汉大中学校以各种名义批判、斗争“右派”学生和教师。华中工学院抓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扫“歪风邪气”37天，383人被划为右派。一千四百余人的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反右”斗了两百余人。武汉医学院被斗学生62人，29人被定为右派。华中师范学院被斗学生三百余人。武汉邮电学院被斗23人。五百多学生的武汉建筑工人技校，逮捕了18人，三十多人被斗（42）。

文革初期“五十天”里，武汉市以“反抗和破坏文革罪”逮捕了四百余人（43），判刑、枪决的案件有的通过法院布告、公审会、新闻报道为人所知，但具体数字无法获取。

注释：

（1）本节的编写，参考了如下资料：王炯华《李达评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王炯华《李达在武汉大学最后岁月》（载《同舟共进》2009年第2期），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造反有理》报编辑部编印《武大“三家村”案——陶铸、王任重精心策划的一场政治大阴谋》（1967年6月）。

（2）关锋、戚本禹与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赴京代表团的谈话（1966·11·18），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年第三版。

（3）武汉测绘学院红旗战团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年11月12日）。

（4）王光照《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10—11页。

〔5〕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28、29页，香港银河出版社2014年版。

〔6〕武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华中工学院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驻沪联络站《刘记叭儿狗王任重简介》（1966年12月，铅印传单）。

〔7〕王任重《在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以来——检查、交代、申辩材料之四》（1967年3月21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年第三版。

〔8〕陆天虹《打倒王、宋反革命联盟——揭穿王任重、宋侃夫长期掩盖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斗争真相的滔天罪行》，载武汉市机关红司市委人民勤务员总部《七月风暴》编辑部印《七月风暴（第六期）》（1967年11月28日）第13页。

〔9〕武汉市情编辑部、武汉市档案局等编《武汉大典第一卷（1949—1976）》第796页。

〔10〕武汉测绘学院红旗战团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年11月12日第六版）。

〔11〕华中工学院革命造反系（原无线电系）红色游击队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九一五支队狂飙编《武汉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6年11月）。

〔12〕《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辛甫罪行录之三》，载武汉市机关红司市委人民勤务员总部《七月风暴》编辑部印《七月风暴（第五期）》（1967年11月14日）第40页。

〔13〕《王任重给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的一封信》（1966年7月3日），载武汉大学长征公社农奴戟战斗队1966年10月25日油印传单。

〔14〕张体学《坚决打倒反革命两面派王任重》，载1968年4月24日湖北日报。

〔15〕省文革办公室毛泽东思想红旗战斗队《走访刘真同志》（1967年1月14日）。

〔16〕《王任重、张体学在湖北省委会议上的讲话——湖北省委常委讨论王任重关于文化革命的问题的一封信》（1966年7月6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年第三版。

〔17〕1958年4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天津召开“向党交心”运动的现场会，4月1日《光明日报》发表社论《引导群众，自觉交心》，这一运动随即在全国工商界、文教界普遍开展。此后的历次运动如1965年“学雷锋”运动中都开展过“向党交心”。个人“交心”材料被各单位党组织保存下来。

〔18〕岑颖义《赤子——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回忆》第84页。

〔19〕刘中秋《1966年6月、8月批斗老师》（网文，2011年）。

〔20〕参见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1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年版。

〔21〕2017年4月笔者访谈武昌实验中学六六届高中生柳英发的记录。

〔22〕武汉一中六八届高中生余德亨目睹。

〔23〕杨胜利《我的文革经历》（未刊稿，2016年）“第二章 风雨初袭”。

〔24〕参见湖北大学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编印《湖北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6年11月）第23—24页。

〔25〕参见夏家保《蝉鸣录——八十回眸》第263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版。夏家保文革时为武汉三中教师。

〔26〕《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辛甫罪行录之三》，载《七月风暴（第五期）》（1967年11月14日）第41页。

〔27〕杨闯《湖北大学文革亲历记》第41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1年版。

〔28〕参见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一二·二六革命造反团《王任重疯狂镇压学生运动的铁证——揭露王任重在〈文化革命动态〉上的一些黑批示》，载1967年2月21日湖北日报。

〔29〕武汉水院文革初期的情况，参见岑颖义《赤子——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回忆》第三章“五十天”；张建成《岁月留痕——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亲历记》“文革篇·一、文革初期”，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4年版。

〔30〕王海峰《钢铁是这样炼成的——一个老三届的回忆录》第31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1年版。王海峰为华工附中六七届高中生。

〔31〕华中工学院文革初期的情况，参见东方红红卫兵华中工学院总部、华中工学院东方红战斗兵团编印《湖北省三级干部必读材料》（1966年11月6日），刘玉民等《喻家山风云——华中工学院文革记忆》（待刊稿，2019年）第三章引入歧途。

〔32〕载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司令部《新华工》编辑部《新华工》报第21期（1967年5月18日）。

〔33〕参见王光照《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11—16页。

〔34〕参见中原机械厂东方红战斗总部《强烈控诉宋侃夫在我厂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载毛泽东思想中共武汉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宋侃夫问题专辑（之五）》（1967年6月9日）第14—15页。

〔35〕参见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6—7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年版。

〔36〕参见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一二·二六革命造反团《王任重疯狂镇压学生运动的铁证——揭露王任重任在〈文化革命动态〉上的一些黑批示》。

〔37〕参见胡国基《幸存者说》（手稿，2005年）。

〔38〕参见中共武汉市委员会《关于我们拘留、逮捕青少年学生所犯严重错误的检讨》（1966年12月17日）。

〔39〕张体学《坚决打倒反革命两面派王任重》，载1968年4月24日湖北日报。

〔40〕参见《彻底清算宋侃夫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载《七月风暴（第六期）》（1967年11月28日）第16页。

〔41〕参见武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华中工学院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驻沪联络站《刘记叭儿狗王任重简介》（1966年12月，铅印传单）。

〔42〕参见二司武大总部《王任重是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载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编《革命造反报》第二期（1966年11月9日）。

〔43〕参见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1987）》第322页。

□ 摘自《武汉地区文革纪实》：第一编 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1967年1月），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02年4月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